

全球化与区域化研究丛书



宋新宁 林 甦◎主编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与欧洲： 机遇与挑战

HOU WEIJI SHIDAI DE ZHONGGUO YU OUZHOU
JIYU YU TIAOZHAN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全球化与区域化研究丛书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与欧洲： 机遇与挑战

HOU WEIJI SHIDAI DE ZHONGGUO YU OUZHOU
JIYU YU TIAOZHAN

宋新宁 林 甦◎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北京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与欧洲：机遇与挑战/宋新宁，林甦主编.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620-5627-0

I. ①后… II. ①宋… ②林… III. ①欧洲一体化—文集②中外关系—欧洲国家联盟—文集 IV. ①D85-53②D822.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0900号

-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 邮寄地址 北京100088信箱8034分箱 邮编100088
-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010-58908285(总编室) 58908334(邮购部)
- 承 印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 印 张 13.5
- 字 数 326千字
-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44.00元

《全球化与区域化研究丛书》

主 编

宋新宁

编 委 会

戴炳然 冯绍雷 冯仲平 官占奎

郝雨凡 胡伟星 黄卫平 顾学武

林 甦 石 坚 宋新宁 王胜今

王正毅 张保生 张小劲 庄国土

Amitav Acharya, American University, USA

Shaun Breslin, University of Warwick, UK

Gunter Heiduk, 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 Poland

Miles Kahl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SA

Peter Katzenstein, Cornell University, USA

Emil Kirchner, University of Essex, UK

Fredrik Soderbaum, University of Goteborg, Sweden

Iran Taylor,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UK

Luk Van Langenhove, UNU-CRIS, Belgium



20 世纪后期，全球化成为人们的主要关注点之一，似乎全球化代表了世界发展的主轴，能否在全球化了的世界中生存和发展，成为评判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企业治理水平的主要标准。当人们讨论全球化时，更多地关注于经济层面，即经济全球化。全球化被界定为“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国界的束缚，进而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然而，人们却很少关注全球化的政治层面，即政治全球化问题。

政治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并非完全同步。经济全球化以“依存性”和“同一性”为主要特征，即民族国家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经济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加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世界经济秩序演变为相对同一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所有民族国家都成为该体系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国际政治体系的特征一直是一种主权—民族国家占主导的无政府状态。经典国际关系理论所阐述的民族国家体系（nation-state system）实际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一种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体系，可以说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国家体系才有了成为全球体系的可能。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兴起的非殖民化运动，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大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进入国际社会，使国际体系从局部的民族国家体系扩展为全球民族国家体系，每一个主权国家都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平等的



地位，尽管这种平等地位并未在现实中得到完全的体现。

冷战结束后，以集团对抗为特征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最终确立，然而全球化的政治走向却截然不同。尽管所有民族国家都是全球体系中的合法成员，但是这个泛义的全球民族国家体系却依旧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冷战的结束使得以强权为轴心的集团对立不复存在，然而国家间对抗和纷争的频度却在强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全世界在经济上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全球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又使全世界在政治上更加碎片化。这就是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相互背离的现实，也是世界局势总体稳定而在局部范围内总是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全球化的发展并行不悖的另外一个趋势是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区域合作并不是 20 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联盟”一直是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化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联合国宪章》第 53 条就曾规定：“①本宪章不得认为排除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用以应付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而宜于区域行动之事件者；但以此项办法或机关及其工作与联合国之宗旨及原则符合者为限。②缔结此项办法或设立此项机关之联合国会员国，将地方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以前，应依该项区域办法，或由该项区域机关，力求和平解决。③安全理事会对于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而求地方争端之和平解决，不论其系由关系国主动，或由安全理事会提交者，均应鼓励其发展。”当然，在冷战时期，由于大多数区域组织均控制在超级大国手中，其作用不过是超级大国推行其对外政策的工具。尽管如此，特别是冷战之后，人们仍在不断重新审视区域化和区域组织的作用。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成功发展。到 2007 年底，世界范围的各种区域组织和区域安排已经达六十多个，而次区域和跨区



域的合作框架和制度安排则更加复杂多样。

区域化被认为是指同一地理区域内多个国家之间基于共同的利益而建立超国家或跨国家联系,进而实现特定的制度性、框架型和常规化安排的发展取向。区域化(包含区域一体化、区域组织、区域合作等)的动因何在?这是一个人们一直争执不休的问题。许多欧洲人确信,世界范围内的区域化趋势源于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都愿意按照欧洲的模式来推动和发展各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事务。更多的人认为,区域化是各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举措。也有人认为,区域化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尚无法和谐发展场景下的自然选择。

整体观之,全球化在特定的功能领域和发展时段内往往更突出地表现为区域化的发展,区域化不仅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获得了新的意义,而且其本身也成为全球化巨大发展的组成部分。由此而论,全球化与区域化具有联动、互嵌和套接的复杂关系,具有交错、融汇和共通的相互影响。更具体地说,各个功能领域的全球化发展往往是以区域化的相应发展为核心而得以展开的,而相邻各国间的区域化发展又往往是这些国家为应付全球化的挑战而作出的应对。因此,对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无法回避区域化问题的研究,同样,对于区域化问题的研究也无法摆脱全球化的背景。否则,全球化研究将会丢失重要的层次、过程和内涵,区域化研究也将会遗漏重要的背景、场域和维度。

在现实的发展中,全球化由经济始而绝非止于经济,区域化以欧盟为最而绝非限于欧洲;因此,相应的学术研究不仅理当考察基于全球化之上的文化现象、治理变革和社会变迁,而且应当分析欧盟以及欧盟以外世界各个地区走向区域一体化的独特路径和不同模式。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所和联合国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所共同合作，组编了这套主题为“全球化与区域化研究”的丛书。在丛书的选目中，我们既重点推出有关研究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学术著作，也突出引介了有关全球化和比较区域一体化问题的深度思考。我们以为，这样一种选择既可以使我们深化对全球化的认识，又可以使我们全面理解区域化发展的意义。我们更希望读者能够从这些著作中领会和体悟我们的用心与用意。

宋新宁

中国人民大学让·莫内终身教授

2014年7月



中国—欧盟关系发展的新契机（代序）

自 2003 年中国与欧盟开始致力于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欧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进程，包括：2004 年欧盟拒绝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2005 年欧盟终止讨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2008 年因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导致中欧峰会推迟，全球金融危机和 2010 年以来的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以及中欧之间围绕光伏产业和通信设备出现的种种纷争，等等。据此，一些人对中国—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产生了质疑。

2012 年以来，中欧关系出现新的发展契机。中国领导层的平稳过渡、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问题走向和缓、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作为中欧关系第三大支柱的正式启动、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确立、《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的出台、新的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的发表等，构成了当前中欧关系的新框架。

一、如何看待当前的欧洲联盟

欧洲联盟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贸易体和对外发展援助体，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正逐步上升。但是，欧盟一体化的发展仍旧未能使



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欧盟仍旧只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国家间集团，而非一个新型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G-20 翻译为“二十国集团”是不准确的）。

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对欧洲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包括其发展模式、实力地位、国际影响等诸方面。但是，欧洲一体化的持续发展和欧盟作为全球政治经济中重要力量的基本发展态势并未受到根本性影响。

在国际事务中，欧盟受其制度限制，仍未成为独立的国际政治特别是国际安全力量，其成员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比欧盟更重要的作用。例如，欧盟在联合国只拥有观察员资格，而英国和法国则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对外关系中，欧盟及其成员国仍旧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国，但是有其自身的追求和优先取向，并在对外行为方式上与美国有很大区别。同时，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发展援助体，其在发展中世界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二、如何界定当前的中国—欧盟关系

2003 年以来，围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内外一直存在争论，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中国和欧盟的共同战略利益，特别是相互利益。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全面”并非无所不包，因为欧洲联盟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有其共同政策。中国—欧盟关系的特点不在于其全面性，而在于其综合性，即不是单维度的，正如目前双方确立的“三大支柱”（政治、经济、人文）相互交融、彼此作用、缺一不可。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战略”是核心，它既表明双方关系的重要性，更表明其对双方的利益共融性。战略关系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其重要性不在于相互“有用”和相同关切，而



在于战略利益的相互不可分性或相互依赖性。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来看，更多表现为“负相关性”，即如果不合作，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台海问题。而中国—欧盟之间的战略关系，则表现为“正相关性”，即只要合作就会对双方都产生积极结果，例如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的“伙伴”是基础，即双方首先都有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其次，存在合作的制度性安排；最后，能够彼此平等相待。就此而言，中国在国际上真正的伙伴关系并不多。即使中国强调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平等性，仍有国家并不平等待我（例如美国），更有些国家难以真正平等地对待它自己（例如很多发展中国家）。

2013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时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经济体，中欧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作为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中欧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这一表述，是我们进一步准确界定中国—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依据，也体现出中国与欧盟关系的特性。

三、中国—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内容

2014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了《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这是中国政府继2003年发表第一份对欧盟政策文件后，发表的第二份对欧盟的政策文件，目的是在总结过去十年中欧关系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形势发展，昭示新时期对欧盟的政策目标，规划今后5~10年的合作蓝图，推动中欧关系实现更大发展。文件指出：“欧盟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战略



伙伴，是中国实现‘新四化’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合作对象。加强与发展中欧关系是中国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中国政府重视欧盟的地位与作用，致力于同欧盟及其成员国一道，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欧洲经济复苏的进程中，全面落实《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的全球影响力。”

（一）中国与欧盟：和平与安全的伙伴

中国与欧盟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全球和地区安全、双边与多边安全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作为和平与安全的伙伴，中国与欧盟的安全合作，除了《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已经确定的合作领域之外，在以下几个方面也表现出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和兴趣。

首先，中国除了进一步加强和提升与欧盟在亚丁湾反海盗军事行动方面的合作以外，明确表示了维护和保障航海自由与安全的立场。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 6 月访问希腊时提出的共同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的主张，无疑对打消欧盟及其成员国在航运安全方面的疑虑，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鉴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与朝鲜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鼓励欧盟更积极地参与朝鲜半岛事务，既能够增加欧盟在亚洲安全事务上的存在，也有利于增加中国在该问题上的回旋余地。

再次，鉴于中国与欧盟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中国与欧盟加强了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特别是在清洁能源和核能领域的合作。

最后，加强中国与欧盟在救灾和应对危机以及人道主义救援送达领域的合作，并正在积极探讨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可



能性。

（二）中国与欧盟：增长与发展的伙伴

中国和欧盟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经济体，都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长期以来，经济领域的合作特别是贸易关系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最主要内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问题所造成的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和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已经对双方的经济增长都产生了影响。应该说，中欧经济已经形成了互为条件、同增同落的相互依赖局面。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问题使双方认识到，中欧经济关系除了继续发展双边贸易之外，应当更加着力于加强双边投资关系，特别是鼓励中国投资进入欧洲。双方正在进行投资协定的谈判，并同意在此基础上，首先从民间然后到官方探讨建立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

发展问题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虽然双方各自关注的重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中国与欧盟都在致力于扩大双方在发展问题上的共识点，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区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的合作。

（三）中国与欧盟：改革与治理的伙伴

欧盟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使得欧洲面临的改革问题日益凸显。没有成员国层面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就没有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此，已经达成共识。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并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目标和措施。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与欧盟自我变革和调整之路更具有紧密结合、彼此借鉴、分享红利的特性，有助于共同提高改革与治理水平。

治理问题是欧洲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中国近年



来日益强调的问题之一。习近平主席最近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为“治理的伙伴”，中国和欧盟在不同层次均存在广泛合作的空间。

首先，在国内治理方面，中国面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艰巨任务，欧盟及其成员国也面临欧债危机冲击下的新治理课题。

其次，在区域治理方面，欧盟尽管因近年来的欧债危机而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但仍旧是世界范围内最成功的区域治理模式，许多经验都值得学习。同时，东亚区域合作一度进展顺利，但是近年来却遭遇了一系列难题。在区域治理方面，双方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同时又都可以通过合作发挥重要的作用。

最后，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和欧盟在全球安全、经济发展、金融稳定、气候变化等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并且已经在 G-20 框架内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四）中国与欧盟：文明与文化的伙伴

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文明与文化关系赋予中欧关系以不同于中美关系的特殊内涵。中国和欧洲不仅是东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而且在历史上就曾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作为文明与文化的伙伴，中欧之间的人文交流不应当是单向，而应是双向的，更重要的应当是“合作型”的。目前中欧文明与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务是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实现这一任务的方式则是相互合作。对外宣传作为单方的行为，其作用是有限的，以相互合作的方式进行的“相互宣传”会更加有效地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进而达致相互理解。

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公众对彼此的了解仍旧有限，因此加强在欧洲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和在中国的欧洲问题研究就显得越来越迫切。近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加大了其对中国的欧



洲问题研究的支持力度；中国在欧洲的孔子学院也有了数量上的发展。孔子学院的建设正在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即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外交的研究）相结合，以在促进中欧双方从相互了解到相互理解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目前，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已经开始了在欧洲建立“中欧当代中国研究学院”的进程。2014年3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签署了共同建立布鲁塞尔中国与欧洲研究学院的合作备忘录，中国的一些企业（例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也开始对此提供资助。应该说，只有当中国的大学教授走上欧洲大学的讲台，中国的大学开始在欧洲招生、授课并颁发中国的学位时，中欧人文交流才算真正进入“相互交流”和“合作交流”的新时期，中欧才算真正成为“文明与文化的伙伴”。

2014年，由于中国与欧盟及欧盟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发展不断出现亮点而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欧洲年”。欧债问题的喷发与和缓、中国新领导层的平稳过渡和一系列对欧新举措的出台，以及逐步浮出水面的欧盟新领导层，都为思考今后中国与欧洲以及中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一直致力于欧洲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自1994年成立，今年恰值20周年。20年来，中心在欧洲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在服务社会、决策咨询和与欧洲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2000年，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被欧洲联盟委员会授予让·莫内最佳欧洲中心，2012年成为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基地。

在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欧洲学会欧洲政治研究会于2014年7月29~30日共同在北京举办了《新时期的中国—欧盟关系》国际研讨会。



本书即是中国和欧洲学者为该国际研讨会撰写的部分论文的集合。

宋新宁^{〔1〕}

2014年7月

〔1〕 宋新宁，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让·莫内终身教授。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与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中欧学术对话》（项目批准号〔13JJD810013〕）和《欧债危机中的中东欧国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项目批准号〔13JJD810014〕）所完成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新葛兰西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与经验

研究评析 / 马 源 (1)

Moving Towards a Political Union? A Neo-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on EU's Developments in the Post -2008

Crisis / Wen Pan Jian Shi (36)

Theoretical Debates on Reg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 Emil Kirchner (70)

政治实体整合中的主权困境探析

——基于欧盟一体化与中国统一案例研究 / 葛 昕 (91)

如何判断欧盟经济的发展前景 / 江时学 (103)

欧洲议会选举之后的欧洲政治走向 / 赵 晨 (114)

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欧盟制度建构及其对中欧

关系的影响 / 刘元元 (120)

欧盟委员会职能与权力的变迁：历史制度

主义的考察 / 曹 蕾 (147)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改革有效性分析

/ 朱凤余 付江媛 蒂姆·波特兹 (167)

A Strategic View on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and Great Power Relations / Sven Biscop (181)

俄欧围绕乌克兰危机博弈的影响及建议 / 毕洪业 (202)